

《淮南子》写作时间新考

熊礼汇

《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故后世学者于其成书之时仅能以揣想之词言之,至于书始作于何时,更无定论。本文考定:《淮南子》的写作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始于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之后,成书于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立论的主要依据有二:一是《淮南子》书中内容所涉及的时事最迟者发生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二是从《淮南子》的思想倾向和西汉前期政治思想情况来看,刘安主编其书是急于在建元二年冬十月入朝献书,其目的是要尽快为执政伊始的武帝提供一套以黄老道学为思想基础的治国治身之术。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刘安等人集体编撰其书所用的写作方法,以及能在近一年内完成其书的奥秘。

《淮南子》是我们研究西汉前期思想文化的一部重要著作。但关于它的写作时间,学者们大都只能言其大概。或谓其“约成书于公元前140年”^①,或谓“《淮南子》成书大约是武帝建元二年前的事”^②,有的干脆说它是“西汉初年杂家著作”^③。显然,弄清《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对深入研究西汉前期的思想文化是有益的。

近年来对《淮南子》写作时间论之较详的有两家。一是牟钟鉴先生,他说:“查刘安入朝在建元二年,把这一年定为《淮南子》成书的年代是恰当的,当时刘安四十岁。”“思想比较成熟,而且在学识上、资历上具备了召集众多宾客撰写长篇的条件。从客观条件看,自平息七国叛乱到建元二年这十多年间,政治上较为平静,《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大约就在这一时期的后半段,完成于刘安入朝前夕。”^④平息七国叛乱是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夏六月的事,自景帝三年到武帝建元二年,共有16个年头,“这一时期的后半段”,自然是指后八年,即公元前146年至前139年之间。牟氏此说可能受到徐复观先生的影响。徐氏尝言班固“这段话(语见下文),正是写在七国平定之后,及武帝即位、刘安入朝的中间;由此可知刘安招致宾客、大事著作,正在他27岁到40岁之间的这段年龄里面”^⑤。刘安“27岁到40岁之间”,正是公元前154或前153年到前140或139年之间。不过牟先生把《淮南子》的写作时间缩短到了“这一时期的后半段”。

二是吴光先生。他说:“《淮南子》的成书时代,史无明载,但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及高诱《淮南子叙》看,当在景、武之间。”“刘安入朝之年乃武帝即位次年,其时刘安已献所作《淮南内篇》(即《淮南子》),则其书必在此前无疑了。从一般情况看,刘安要招致众多人员编出几十万言的书,不是一年就可完成的。因此,《淮南子》很可能是景帝时写成,到武帝时才献上。”^⑥吴氏此说实本于张岱年先生所言:“淮南王刘安召致宾客,写成《淮南内书》。这书可能是景帝时写成,到武帝时献上。”^⑦

上引二家之说，实是大同小异。除表述笼统时间的概念外，具体结论与事实不合。先说《淮南子》成书即完稿的时间。

《汉书·淮南王传》说：

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又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

文中“内书”、“内篇”皆指《淮南子》。班固的话实已说出《淮南子》成书的下限时间，即武帝登基后、刘安初入朝的那一年。《史记》刘安本传言“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资治通鉴·汉纪九》说建元“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来朝”。汉初沿袭秦制，冬十月为一岁之首。据此，则知《淮南子》成书于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之前。所以牟钟鉴先生说“把这一年（建元二年）定为《淮南子》成书的年代是恰当的”并不恰当。又建元二年为武帝即位的第三个年头，因此吴光先生说“刘安入朝乃武帝即位次年”，分明弄错了武帝改元的年代，而把刘安入朝时间提前了一年。既然如此，说“其书必在此前无疑”便是大有疑问。较为可靠的结论是：《淮南子》定稿于建元元年年底。

再说《淮南子》的写作始于何时？

关于这个问题，东汉高诱有一个说法。他认为令刘安限时作《离骚赋》的是文帝而不是武帝。由于作《离骚赋》，刘安声名大振，“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⑧。高诱说《淮南子》写作始于作《离骚赋》之后，无疑是对的，但后到哪一年，不知道。但他所说的背景材料，对了解《淮南子》的写作时间是有帮助的。

下面，我们想从著作本身和作者的写作动机这两方面来探索《淮南子》开始写作的年代。

《淮南子》卷11《齐俗训》有言：“夫雕琢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废、女工伤，则饥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能不犯法干诛者，古今之未闻也。”这段话，除个别字有改动，句式有所调整，皆取自景帝在后元二年（公元前142年）夏四月所颁发的一道诏令。因此可以断言，《淮南子》开始写作的时间不会早于景帝后元二年。那么会不会始于后元二年之后的“景帝之时”呢？《淮南子》卷六《览冥训》谓“逮至今之时，天子在上位，持以道德，辅以仁义”云云，《汉书》明言刘安入朝向武帝献所作《内篇》，可见这个“天子”只能是汉武帝，“今之时”只能是武帝在位之时，故高诱注谓“天子，汉孝武皇帝”。据此可以推定，《淮南子》的写作不会始于武帝即位之前，也不是完稿于武帝即位之前。说它“可能是景帝时写成”，是没有根据的猜测。史载景帝刘启于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甲寅日崩于未央宫，十天后，太子刘彻即皇帝位。刘彻即位次年改元建元。也就是说，从刘彻登基到刘安入朝献书。其间相距约一年零九个月。《淮南子》的写作，从酝酿到撰稿到成书大概就用了这一年零九个月的时间。而真正动笔写，似乎仅用了11个月。何以见得，有书为证。《淮南子》卷二《俶真训》中说：

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一椽而轮之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于天地之情也。

卷六《览冥训》说：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掣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致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殫尽大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止水。

卷二十《泰族训》说：

今商鞅之启塞，子之二符，非之孤愤，仪、苏秦之纵横，皆掇取之权，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之恒常，博闻而世传者也。

此外，卷二十一《要略》还用追根溯源的方法揭露申、商、张、苏主张之弊，并斥持其论者为“遁一迹之路，一隅之指，拘系牵连之物，而不与世推移”。《淮南子》自始至终抨击申、韩、商、张、苏之术，言其“非治之大本”，实与当年一件时事有关，诸多挾伐之词正表现出作者对武帝即位之初一项政治举措的拥护态度。史载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馆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⑧。由此可见，《淮南子》卷二、卷六、卷二十以至卷二十一写作不会始于建元元年冬十月之前。刘安主编《淮南子》，是与众助手“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⑨。是书既出自众手，而其“宗旨及体例，计必先行规定，然后从事；或安自总其成，亦未可知。观《要略》所提挈各篇要点及排列次第，盖匠心经营，极有伦脊，非漫然赖祭而已”^⑩。因而众作者动笔的时间应该大体相同，所以卷二、卷六、卷二十等篇开始写作的时间，也就是全书开始写作的时间。这个时间只能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之后。

《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只能在建元元年冬十月之后至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这个期间，这是由刘安主编其书的动机所决定的。

有人认为，刘安主编《淮南子》是为了和武帝崇儒对抗，并说这种政治思想上的对抗和他后来的“谋反”一脉相连。此说大谬。一则刘安献《淮南子》给武帝之后，过了五年，才有董仲舒、公孙弘出来倡导儒术（时在元光元年，即公元前134年），武帝才采纳董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二则所谓刘安“谋反”本是冤案^⑪。实际上，刘安主编《淮南子》的目的是要为新即位的帝王提供一套以黄老道学为理论基础的治身治国之术。

刘邦建国，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当陆贾建议以黄老道学治国，倡言“道莫大于无为”，“故无为也，乃无（不）为也”^⑫时，便得到了刘邦君臣的支持。《史记》即言陆贾著《新语》，“凡十二篇，每秦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之万岁”^⑬。此后，由于萧何、曹参、陈平等老臣和文、景二帝及窦太后等人的努力，西汉前期基本上坚持的是一条以黄老道学为理论基础的思想政治路线。“文景之治”的出现，标志这条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坚持以黄老道学治国是很不容易的。《史记》所谓“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指景帝）及太子（指刘彻）、诸窦不得读黄帝、老子书、尊其术”^⑭，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这位窦太后坚持以黄老道学治国，可谓不遗余力。不但辅助儿子忠实执行文帝以黄老之道治国的路线，还着意培养孙子习黄老之言，尊黄老之术。孙子即位后，还督促他推行黄老之道。就在刘安献《淮南子》的那一年，窦太后还出面要武帝罢免了支持用儒学与黄老道学对抗的丞相和太尉，逼得当事者在狱中自杀。刘安是赞成窦太后的政治思想的，也希望武帝能坚持用无为而为的黄老道学治身治国。但他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不可能像窦太后那样督促武帝。于是他便想到仿效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吕氏春秋》而为秦王提供统一天下、治理国家的方略的做法，编写一本书来为武帝提供治政之方。特别是在建元元年冬十月，17岁的武帝同意丞相卫绾之奏，以“乱国政”为由，罢黜所有被各类高官推举而信奉“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之士^⑮，更使他受到鼓舞，以为武帝其人孺子可教，便组织宾客马上动手编写其书。刘安这种动机也反映在书名上。其书本名“鸿烈”（或谓淮南鸿烈，始称其为《淮南子》），高诱言“鸿烈”乃刘安“以为大明道之言也”^⑯，甚是。《鸿烈》所明之道，正是以黄老道学为依归的帝王之道。他很自负地称之为“刘氏之书”^⑰，并把它献给武帝，其属意所在，亦可想见。有的学者称《淮南子》为“资治哲学”、

“帝王教科书”，是看出了书的实质和刘安主编其书的良苦用心的。

从刘安编书的动机和著作提供的材料，我们断定《淮南子》的写作时间在建元元年冬十月后、建元二年冬十月之前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也许读者会像吴光先生那样，认为“从一般情况看，刘安要招致众多人员编出几十万言的书，不是一年就可完成的”，对此有必要加以解释。

首先，《淮南子》的文字只有 15 万多一点，就是加上标点符号也只有 17 万多一点，不是通常所说的“几十万言”。

其次，刘安并不是到了编写《淮南子》时才去“招致宾客”，而是如同高诱所言，早在文帝令刘安作《离骚赋》之后，天下有才之士就开始聚集到他身边，其中不乏诗文兼擅之辈。《汉书·艺文志》著录刘安及其宾客著述数种，多数成于《淮南子》之前。这说明刘安主编《淮南子》之前，确已“折节下士，招致英俊以百数”^①，已经积累了集体编书的经验。

再次，《淮南子》牢笼天地，博及古今，但主要是对战国末期以来、特别是秦汉以来黄老道学的总结，这个时期众多的黄老道学著作，为它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虽然《淮南子》有许多创见，反映出文、景时期黄老道学的新特点，但这主要是通过摭摭众家黄老道学著作（采儒墨名法）的观点，加以发明、解说完成的。比如，《道应训》几乎是用事例证明老子的观点正确，《俶真训》讲宇宙天地的由来，实际上是对《庄子·齐物论》中“有始者”、“有有者”二句的发挥。《天文训》依《吕氏春秋·音律》之说而详言十二律和二十四节气的对应关系，《地形训》中诸多地理观念来自《吕氏春秋·有始览》，《时则训》实是将《吕氏春秋》中十二纪首集成篇。《泰族训》中“圣主在上，廓然无形”一段，出自陆贾《新语·至德》。《原道训》对“道”的描述，许多文字出自黄老帛书《道原》。《淮南子》取自黄老道学著作的观点、材料以至文字，实在举不胜举。他如袭用《论语》、《孟子》、《列子》、《管子》、《韩非子》、《晏子春秋》、《战国策》、《礼记》等典籍中的材料也不在少数。胡适说“淮南王与《吕氏春秋》性质最相似，取材于吕氏也最多”^②，毕沅指出“《文子》十二篇，淮南王书前后采之殆尽，间有增损一二字，移易一二语以成文者，类皆当时宾客所为”^③，他们的话是符合实际的。刘安和苏飞、李尚等“八公”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均为才思敏捷之士，如此编写其书，《淮南子》自能在将近一年之内完稿。当然，时间是紧了一些，所以孙星衍在分析《淮南子》抄引《文子》语句增减其字、误解其意而用之的原因时，即言此“由当时宾客迫于成书，不及修辞达意”^④所致。

注 释：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卷》

② 金春峰：《汉代思想史》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

④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研究》

⑤⑫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

⑥ 吴光：《黄老道学通论》

⑦ 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⑧⑩⑬ 高诱：《淮南子叙目》

⑨ 见《汉书·武帝纪》

⑪ 梁启超：《汉书艺文志诸文略考释》

⑬ 陆贾：《新语·无为》

⑭ 见《史记·陆贾传》

⑮ 见《史记·外戚世家》

⑰ 见《淮南子·要略》

⑱ 见《汉书·伍被传》

⑲ 胡适：《淮南王书》

⑳ 毕沅：《吕氏春秋新校正序》

㉑ 孙星衍：《问字学堂集·文子序》